

邓小平理论 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现实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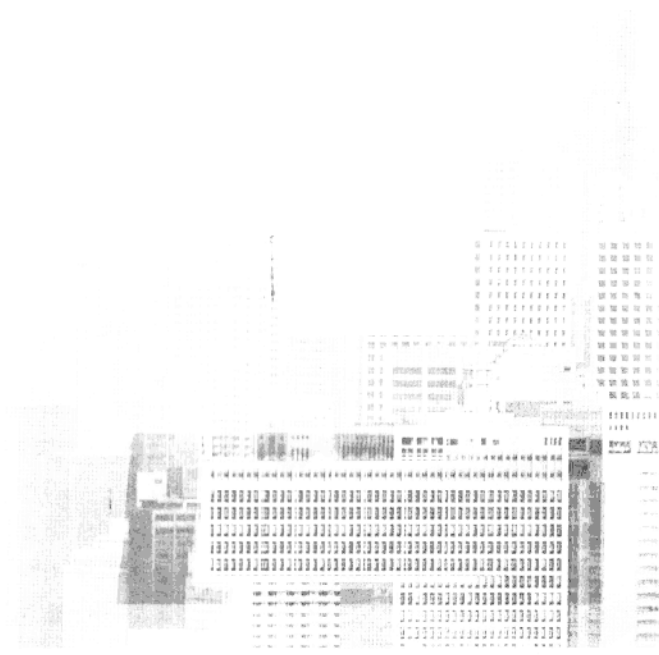
孙志东 苟志效◎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 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现实问题

孙志东 苟志效◎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孙志东、苟志效
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8

ISBN 7 - 81029 - 964 - 6

I. 邓... II. 孙... III. ①邓小平理论 - 研究 - 文集 ②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A849 - 53 ②D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5032 号

责任编辑:陈才俊

封面设计:山 内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510630 广州·石牌)

印 刷: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

字 数:290 千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哲学的时代意义与新世纪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发展	林钢塔 (1)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王灿斌 (7)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潘振结 (13)
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	郑祖通 (21)
浅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	陈运彪 (27)
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	林加祥 (33)
坚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法宝	
.....	何志杰 何松华 (44)
坚持实践标准, 推进新的思想解放	袁旭光 (51)
浅谈邓小平的“务实”“求真”“寻善”思想	黄仁铨 (59)
邓小平理论是开启中国知识经济时代的金钥匙	周玉东 (66)
论邓小平的系统思想	赵银月 (73)
关于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几点认识	孔红艳 (80)
思想解放与湛江发展	朱伟坚 (87)
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精髓, 促进梅州	
经济发展	杨祖仁 (95)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增创东莞新优势	冯 洁 (103)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	孙培存 (109)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理论创新	张秋平 陈耿之 (114)
略谈中国特色的发展哲学	芮 和 (121)
略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战略与实践	武 晟 (127)
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与实践	陈金宏 (134)
试论中国社会发展之路	钟振中 (141)
20 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哲学思考	吴树祥 (149)
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价值	黄 玮 (157)
经济发展必须与人的发展协调共进	黄仁铨 (164)
对当前思想道德建设所遇困境的审视	秦光涛 (173)
试论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吴伟平 (180)
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孙志东 (187)
浅谈市场经济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正效应	方明东、刘家辉 (192)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须全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	李高扬 (197)
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 必须清除封建遗毒	陈健恒 (204)
浅论具备邓小平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首要 条件	林声隆 (211)
改革的哲学思考	刘 波 (217)
哲学的本性、生产力的定义及其他	何 明 梁 宏 (223)
资源·制度·生产力	尹立民 (229)
坚持以变应变, 有所为有所不为, 提高国有 企业的主导作用	李华林 (234)
浅析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意义及其内在矛盾	程 畅 (239)
科教兴国是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	刘梦如 (243)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刘俊芳 (253)
50 年量变中的伟大巨变	冯 洁 (260)
更新观念, 增创广东新优势	林昌乐 (268)
论经济特区第一次创业的主要经验	胡国民 (275)

论深圳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	黄 涛 (284)
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经验	吴壮伟 (287)
广东 50 年思想文化建设的历程与辉煌	吴灿新 (294)
广东教育应确立四大观念	韩祐生 成 亮 (304)
创建新世纪的梅州精神文明	蔡晓红 (313)
深圳—梅州对口扶持协作发展的调研报告 深圳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319)
加强学习, 深入实践, 推进新世纪宏伟事业	杨祖仁 (331)
关于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哲学思考	王政友 (338)
求实与创新	王政友 (345)
提高外来员工素质之我见	李秋巧 (353)
设市反思	成 亮 (359)
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郭彦领 (365)
谈谈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 张利霞 杨 勇	(373)

哲学的时代意义与新世纪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发展

林钢塔

—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蕴含着哲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作为时代精神反映、升华的结果，哲学总是折射着时代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时代精神又通过哲学的积淀，成为突破具体时代限制的超越指向。

哲学和时代的关系是辩证的互动关系。哲学具有受动性，使哲学无法选择其出发的初始条件，即作为历史给定的绝对前提；但是哲学又具有能动性，使哲学能够为人类重构和扬弃历史给定的前提，审视现存的一切事物并重新估量，确立自身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哲学的价值所在，也是其超越性的所在。真正的哲学，总是时代的先声。辩证地理解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既为我们在新世纪进行哲学思考提供参照，也为我们在新世纪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提供思想前提。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折射着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时代精神的内涵，是这一特定时代孕育、升华的结果，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又通过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的积淀，并超越其具体时代维度的限制，从而起到导向的意义。思考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应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去剖析。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同样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邓小平所处的历史存在决定了邓小平本身必须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来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而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这一基本实践活动来把握中国的命运。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的能动性充分体现在超越历史给定的前提，对给定的历史前提予以重构和扬弃，确立自己的理想境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超越教条和空想的理性实践上。

二

以哲学视觉对 20 世纪的发展状况进行回顾，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一个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深刻影响的世纪。它具有不同以往世纪的时代特质。从哲学反思上观察 20 世纪世界的现实存在，可为 21 世纪哲学反思准备了丰富的内容，也可为新世纪哲学反思提供历史前提。在一定意义上，新世纪的人类发展走向和选择，正是通过对这一前提的反思才得以昭现。那么，21 世纪哲学的走向不能不关注 20 世纪世界的重大变化。这同样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在新世纪中的走向必须关注并超越的现实基础。

第一，新科技的勃兴，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内容。它重构了人们解读世界的方式和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预示 21 世纪的走向。20 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

式，另一方面也重构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新的科学理论，向人们重新描绘了世界图景，使人们的视野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扩张，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解读方式。其中思维观念的更新，解读方式的改革，意义更深远、更重大。现代科学瓦解了传统科学的基本信念，但也显示出本身具有的危机。20世纪中期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改变人的交往方式，使遥不可及的远距离交往在瞬间完成成为现实。交往手段的信息化、内容的网络化，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势必带来人类价值选择的改变。信息社会继续强化了人的物化趋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其后果潜伏着由知识支配自然向知识支配人的转变。

第二，现代化运动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化问题凸现。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体现在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的理性化，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人类精神的主体化等不同层面上。随着“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20世纪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模式开始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经济增长的理解，而是扩大为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体进步的理解。

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问题被凸现出来，全球化关系到整个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当代人类对自然超负荷地征伐，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平衡系统，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信息时代的来临，使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问题加剧。全球化的凸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如何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怎样在保持科技进步的同时，避免人类文明的灭顶之灾？这是21世纪必须面对、解答的内容。

第三，东西方文化交往加深，相互置换，不断整合。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往加深，全方位、多层面互相置换整合。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日益暴露，由此展开了超越自身的批判，开始以

东方文化作为自我反思的参照，以东方见解弥补自身的不足。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不断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以改变自己的积弱状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成果。改革开放，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文化做出的新的选择。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确立，邓小平理论对科技作用的卓越见解所体现的对理性精神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以西方文化作为自我审视之镜的肯定。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中，东西方文化各自发现自身的不足，彼此都通过援引对方的文化弥补自身文化的缺陷，但并未能得到真正的整合，东西方文化之间理性与价值的裂痕依然强烈地冲突着。21 世纪的东西方文化能否在全球化中得以真正整合，这对人类是一个挑战和抉择。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探索。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实践运动的探索开始。20 世纪，以列宁和毛泽东为首相继在俄国和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历史性转变。在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效法性，在价值尺度和理性尺度的选择上，两者经常无法协调，以致往往以目标代替过程，追求超越阶段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道路曲折艰辛。苏联正是在这一曲折过程中解体的。

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与理性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对中国特色这一现实前提的确认体现了客观理性的态度，同时作为民族性特质提出，又内含着一种价值评判；另一方面，就社会主义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运动，它是导向理想境界的现实过程，是视野内的东西，同时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又具有参照价值。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对价值尺度和理性尺度相结合的现实选择。21 世纪，将是真正实现理论可能性的探索的世纪。

三

时代的发展，处于历史交接路口的人类呼唤着哲学的复兴。21 世纪中国面临的使命，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这种发展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的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精神的变迁不断作出新的构筑；二是选择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合适的存在方式，以摆脱自身被曲解的状态，真正实现自身的内在扬弃。

第一，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必须担当起 21 世纪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在形而上层面上把握理性和价值内在的整合，从而为我国探索自身特质的现代化实践和认识提供终极参照，发挥理论自身应有的功能。

20 世纪，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是理性扩张极致的结果，是文明成熟的标志，也是文明危机的预示。理性的扩张，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的独断化，导致价值的颠覆、精神的贫乏和情感的缺乏，蒙蔽了人的价值世界，理性和价值关系严重失衡。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危机，我们并未进行深刻的反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人们更倾注于自己的物质利益、权利、享受等生存现实。但人们在找到物质的栖息之所后，却丢失了自身的精神家园。价值理想遭到摒弃，从而丧失了自省和批判的能力。

时代的使命，赋予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必须对西方现代化予以形而上学的深层反思批判，找到了价值与理性的整合点，为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终极关怀。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同外界进行交往，关注科技发展新趋势，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方法论，站在当代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清醒地审视过去，深刻地把握现在，正确地导向未来；回答全球化问题，化解全球化风险，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同时，为

了生存，中国人必须有超越自然的自我意识的内在尺度，确立自身的精神价值，把科技理性置于价值尺度的约束之下，并把价值理论渗透于理性视野内的历史活动中。这对建构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自足的意义世界十分重要。应答这些领域的问题，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才能揭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在 21 世纪发展的趋向。

第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是存在着的社会现实，应找到自身恰当的定位，以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构建发展自己，克服自身被曲解的状态。

只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终结。但在实践中，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存在着可能被曲解的危险，主要是在经济、政治、科技、世俗观念等外在的东西上，出现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价值的掩盖，从而导致新世纪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价值的否定。因此，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中克服邓小平理论的哲学价值被蒙蔽的倾向，同时要纠正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全能化的倾向。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夸大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功能的现象，把非哲学视野的东西纳入并乱贴标签，越俎代庖地解决社会细小的具体现实，导致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形而上学性地丧失。只有这样才能给 21 世纪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以恰当的定位，克服自身被曲解的状态。

（作者单位：中共汕头市委党校）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王灿斌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概括来说，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实事求是论、矛盾精髓学说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三个方面。

一、实事求是论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哲学依据，而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是这一理论的本质要求。

第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实事求是。在社会领域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必须认清“实事”所指的具体社会历史状况。历史是发展的，“实事”也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要解决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争取民族独

立与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邓小平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实事”的不同，决定了“求是”的内容、方式的不同。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逐步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思考，我党逐步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促使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成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至此，邓小平理论逐渐步向成熟，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因此，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它实际上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第二，实事求是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要保证。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①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根据。由于宇宙世界的无限性和客观事物的不可穷尽性，我们的认识永远只是一个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真理无穷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止境。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产物，它从不宣称自己是穷尽了一切现实问题答案的“终极真理”，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体系，其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战无不胜，就在于它的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使它成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科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科学的理论形态。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动力和生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理论，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这一理论的本质要求。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江泽民同志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邓小平理论虽然对社会主义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但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会给这一理论增添新的内容和要求。当今世界形势变幻莫测、错综复杂，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关键时刻，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既是困难又是考验。对于目前国际国内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把邓小平理论与目前的建设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不会使邓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

平理论僵化、教条化，才能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保持其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二、矛盾精髓学说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矛盾统一体，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

第一，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个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② 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因此，我国在所有制问题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共性的。但问题是私有制要消灭到什么程度，公有制要达到什么高度，这就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和照抄照搬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是把某种带有个性的东西当作共性来用。无论是照抄书本上的结论，还是照搬别国模式，都违背了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矛盾精髓学说的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特点。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把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中国特色的个性结合了起来。

第二，一切国家现代化的共性与社会主义中国个性的统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不承认这一点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但这种不同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①过去，把有些本来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硬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排斥，把有些本来是束缚生产力的东西硬说是社会主义而加以固守，就是因为我国囿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②这就突破了以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不同社会制度标准的传统观点，使我们不再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昏头昏脑、神经过敏；使我们可以大胆采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人类文明的共性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个性的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孤立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快、统一的世界历史逐渐形成的新时期，更不可能脱离人类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的轨道。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不仅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同时还要对人类文明进行扬弃，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国。在发展中既要保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个性，又要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汇入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道中去；既不能搞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又不能搞抱定传统不放的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② 《邓小平选》第三卷，第373页。